

品唐
十宋
家小

欧阳修小品

安
越
选
注

文化艺术出版社

欧阳修小品

安越选注

文化艺术出版社

欧阳修小品

安越选注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25 字数：150,000

1997年1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7-5039-1539-0/1·682

定价：12.60元

出 版 说 明

因为我社《明人小品十家》的编辑出版，获得了不少好评，于是，就有了续编《唐宋小品十家》的想法和今天的这套丛书。

小品作为散文一脉，虽滥觞甚远，然而却实在没有严格的界定与模式。只是明清之际的文人抒写性灵，做出许多任情率意的轻灵文字之后，人们便习惯于把小品文与轻松闲适联系在一起。本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等人的提倡与推广，遂使小品文定位于悠闲与轻灵之间。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左翼作家，对此非常愤慨，并明确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入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然而，文学理论上的界定，并不一定能成为社会的共识。近年来，图书市场上小品文大行其道，人们对小品文的理解，似乎仍脱不了“性灵闲适”的范围。我们在编辑《明人小品十家》时，也还是本着轻松明快的旨趣。

唐宋两代的小品，却无明清那般风格齐整，更不用说轻灵秀美了。唐人文尚辞赋，四六文作得颇为精彩。虽然有韩愈、柳宗元力倡古文，但他们抒发真性的方式是诗。宋人比较清通，尤其是他们的语录，写得格外洒脱平易，意味隽永；可他们更喜欢在词令中倾诉自己的感情。因此，唐宋之际，虽有八位散文家比肩而出，但他们的文章更多的是凝重、庄穆，甚至有些沉重。如果仍拿着“性灵闲适”的尺子来编纂唐宋小品，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好在小品文并不等于性灵通脱，借用鲁迅的话说：“讲些小

2 欧阳修小品

道理，或没道理，而又不是长篇的，才可谓之小品。”按照这样的思路，参考作家的声望和代表性，我们为《唐宋小品十家》选择的作家是韩愈（昌黎）、柳宗元（河东）、罗隐（昭谏）、皮日休（鹿门）、陆龟蒙（甫里）、欧阳修、王安石（介甫）、苏轼（东坡）、陆游（放翁）、刘克庄（后村）。书的命名，则根据其本人较为常见的字号而定。

既然是小品，简洁似乎是必需的条件。所以，涉及到每个作家的作品选取时，我们也要求尽量不选那些宏篇巨制或“板着面孔”说理的文章，即使是公认的名篇，也不妨割爱；而诸如柳宗元的游记、欧阳修的书简、苏轼的题跋，虽然不足以反映他们文学成就的主要方面，但却因为不曾带有太多的“载道”重任，而自然流露出作者较为真实的内心层面。类似的篇什，是我们希望能奉献给读者的。

尽管如此，唐宋之际的小品文，与明人还是有明显的差别。韩、柳、欧、王姑且不论，即使被鲁迅大力推崇的罗、皮、陆的作品，其中的不平、愤懑、沮丧甚至绝望，也是在明人小品中很难体会到的。这也许正是小品文特征的另一层面的展示。读读它们，人们应该别有一番滋味。

从明人小品到唐宋小品，选题的确定更多地是从市场去考虑的。然而，如果以此为契机，对历代的小品文作一番重新的检索与梳理，也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当然，任何想法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前 言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卒于神宗熙宁五年（1072），卒谥“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

欧阳修四岁时，其父欧阳观卒于泰州军事判官任上，年仅二十九岁的母亲自守贞节，因家贫无依，投靠随州任推官的叔父欧阳晔。在母亲的教育下，欧阳修从小刻苦自学：

太夫人以荻画地，教以书字，多诵古人篇章，使学为诗；及其稍长，而家无书读，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或因抄录，抄录未毕而已能诵其书，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自幼所作诗赋文字，下笔已如成人，兵部府君阅之，谓韩国夫人曰：“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惟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

——欧阳发《事迹》

天圣四年（1026），欧阳修携文拜谒当时在汉阳的学士胥偃，备受激赏，并将自己的女儿许嫁欧阳修。天圣八年（1030），翰林学士晏殊主持礼部贡举，欧阳修名列第一；三月御试崇政殿，中甲科第十四名。五月，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留守推官，开始了他长达四十二年之久的政治和文学活动。

景祐元年（1034），升任馆阁校勘，参与编修《崇文总目》。

2 欧阳修小品

景祐三年（1037），因为被贬落职的范仲淹仗义直言，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后又调任光化军乾德县令，迁武成军节度判官。康定元年（1040），召还京师，复职为馆阁校勘，进集贤校理。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鉴于当时积贫积弱的国力，任用了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实行了著名的“庆历新政”。欧阳修也因此被任命为谏官，并拜知制诰，派他视察河东前线，又升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转运使。由于范仲淹的改革，触动了保守势力的利益，而受到激烈的反对。庆历四年，新政失败，范仲淹、杜衍、富弼、韩琦等人相继被黜。当此危急之时，欧阳修上书直言，指出：“今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欧阳修的直言，招致反对派的忌恨，终于诬陷构罪，在庆历五年贬欧阳修知滁州。这一年，欧阳修三十九岁。

庆历新政的失败，对欧阳修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给他的精神上和心理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在治平年间致焦千之的一封信中不无感慨地写道：

一从吏事，便礼法所绳，若居人下而欲有设施，则世事难如人意。更当屈伸取舍，要于济务，此非独小官，自古圣贤，尚以为难。

——《全集·书简·卷九》

从庆历五年以后的文章中，人们也不难发现欧阳修对新政失败而常发出的无奈与感慨。

从庆历五年起，欧阳修历知滁州、扬州、颍州、应天府等地方官。他本着“节用以爱农”的主张，所到之处，清静简政，给地方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先公平生连典大郡，务以镇静为本，不求声誉，治存大体而施設各有条理，纲目不乱，非盗贼大狱，不过终日，吏

人不得留滞为奸。如扬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多事，公至数日，事十减五、六，既久，官宇阒然。尝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事弛废而民受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去其繁碎尔。故所至不见治迹，而民安其不扰。既去，至今追思不已，今滁、扬二州，皆有生祠。

——欧阳发《事迹》

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奉召回京，任翰林学士，与宋祁等共修《新唐书》。次年，奉旨出使契丹。嘉祐二年（1057），主持礼部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本传》）欧阳修通过主持贡举，不仅举拔了苏轼、苏辙、曾巩等青年士子，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宋初以来科举考试中的恶劣文风。这被后人视为欧阳修的重要政绩之一。

此后，欧阳修又相继升任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枢密院副使等要职。然而，随着地位的变化，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宦海沉浮的险恶；而刚直不阿的天性，又不允许他因循苟且，故屡屡受人谗言甚至莫须有的污陷。治平四年，御史彭思永、蒋之奇竟然以“帷簿不修”诬告欧阳修，虽然阴谋没有得逞，却使他彻底抛弃了对官场的依恋。早在皇祐元年（1049），欧阳修知颍州时，就把颍州选作退隐的归宿，并托好友梅尧臣在此置地安家。此时，他更加坚定了退隐的决心。在致韩琦的一封信中，他态度鲜明地表示：

某去就之际，不惟果于自决，而相知者皆勉以必走不疑。亮公见爱素深，意必不殊也。此来，赖君相之明，为之辨别，皎然明白，中外无所疑惑矣。则某之引去，不嫌稍速。所推恩礼，不必过优，使灾难中遂逃祸咎，而保安全于始终。

——《全集·书简·卷一》

在上书致仕不果之后，他又主动要求外放，并坚辞出任宰相的机会，“初有太原之命，令赴阙朝见，中外之望，皆谓朝廷方虚相位以待公。公六上章，坚辞不拜。”（《事迹》）在先后历知亳、青、蔡三州之后，终于熙宁四年（1070）获准告老退休。“公既气貌康强，而年未及礼制，一旦勇退，近占数百年所未尝有，天下士大夫仰望惊叹。”（同上）。第二年闰七月，于颍州逝世，享年六十六岁。

作为一个宦海沉浮达四十年之久的士大夫，欧阳修在政绩上似乎并没有太多值得瞩目的成就。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人格魅力和高尚情操对当时和后世人们的强烈感召力。

欧阳修为官四十载，几上几下，被贬在外的时间超过二十年，而他每次被贬，几乎总是因为仗义直言而召来嫉恨。景祐三年贬夷陵，是为了上疏援救范仲淹；庆历五年贬滁州，则是为范、杜、富、韩四位执政鸣冤所致；治平四年受人构陷，则是由于他在“濮议”之争中的力排众议。《宋史·本传》称其“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穽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不悔也。”欧阳修的这种梗直刚正的性格，甚至得到皇帝的激赏，宋英宗当面称修“性直，不避众怨”。宋仁宗则对待臣说：“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并免试直接任命欧阳修知制诰，以示嘉奖。（事见《宋史·本传》）诚如《事迹》中所议：“公亦以身许国，进退出处，士人以为轻重，至于接物，乐易明白，无有机虑与所疑忌。与人言，抗声极谈，径直明辩。人人以为开口可见肺腑。”

与这种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的品格相对应，欧阳修还表现出宽容大度、不计得失的坦荡襟怀。早在夷陵之贬后，他在《与尹师鲁书》中就这样写道：

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死，真若知义

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

正因为有了这种坦荡的胸襟，才能有“江山美秀，而邑居缮完，无不可爱”的真诚，才能有“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乎其中者，太守醉也”的自适；也才能有“乐其地僻而事，又爱其俗之安闲”的通达。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坦荡的胸怀，才能使欧阳修即使对自己的政敌，也能宽容相待。庆历五年，欧阳修之贬，是受到钱明逸等人的构陷。但“自外还朝，遇明逸于京师，屡同饮宴，不以为嫌。其后公在中书，明逸罢秦州归，复用为翰林学士。”治平四年，蒋之奇等人对欧阳修无端诽谤，欧阳修被迫自请知青州，恰巧蒋之奇之兄蒋之仪任临淄县令，为欧阳修所辖。当朝权贵不喜蒋之仪，托欧阳修相机“坏之”，“公察其实无它，力保全之”。

对待政敌尚且如此，对待朋友更是“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欧阳发《事迹》中载：“先公笃于交友，恤人之孤。梅圣俞家素贫，既卒，公酹钱于诸公，得钱数百千，置义田以恤其家，且乞录其子增。尹龙图洙已卒，公乞录其子构。孙先生复有《尊王发微》十五卷，有旨进内，未毕而卒，公乞令其家录进，而推恩其子大年。”

至于奖掖后学，爱惜人材，更是急之如恐不及。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人都是在他的赏识、简拔之下闻名于世的。而《墨庄漫录》所载的一段轶事，尤可窥见欧阳修精神境界中的闪光之处：

欧阳公于修《唐书》，最后至局，专任纪、志而已，列传则宋尚书祁所修。朝廷以一书出两手，体不能一，遂命公看详列传，令删革为一体。公虽受命，退而叹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多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于是一无所

易。”御史曰：“旧例修书只例局内官高者一人姓名，公官高宜书。”公曰：“宋公于列传亦功深者，为日且久，岂可掩而夺其功乎？”于是纪、志书公姓名，列传书宋姓名。宋公闻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让而好相陵，此事前所未闻也。”

居功不傲，临危不辞，宠辱不惊，推诚待人，所有这一切，不仅构成了欧阳修平易坦诚，雍容大度的人格魅力，也体现了他风节凛然、清明脱俗的精神境界。正如王安石所说的那样：

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以学术之精微，故形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阔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手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感世路之岖崎，虽屯遭困蹶，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有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祭欧阳文忠公》

这既是对欧阳修学识文章的讴歌，也是对其人格品德的赞颂。无论从那个角度说，欧阳修都不愧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然而，尽管欧阳修认为“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容斋随笔·卷四》）尽管他于学者求见之际，“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宋史·本传》）但欧阳修最有成就，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仍然是他对文学，特别是对散文创作方面的贡献。

欧阳修是宋代学术思想上首开风气的重要人物，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很有建树。在经学上，他“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在史学上，他主修了《新五代史》，被后人誉为深得

《春秋》笔法。并奉召参与了《新唐书》的编纂。这是在中国古代社会“正史”修撰中是绝无仅有的。在金石学上，他所编纂的《集古录》搜集历代青铜器和石碑拓本，并在跋尾中加以考辨，成为传统金石学史上里程碑的著作，虽然今只存十卷，仍不失为治金石者必读的文献。欧阳修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人，其清新自然而带有散文化的诗歌，尤其是歌行，在开宋诗风气方面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欧阳修的词，清新委婉，被后人认为是“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而其以口语入词的手法，更是直接促进了宋词的发展。

但是，最为后人所称道的，还是欧阳修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宋叶涛在其《重修实录·欧阳修传》中写道：

国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剝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如杨亿、刘筠辈，其学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于流俗，反吹波扬澜，助其气势。一时慕效，谓之“昆体”。时韩愈文人尚未知读也。修始年十五、六，于邻家壁角破篋中得本，学之。后独能摆弃时俗故步，与司马迁、贾谊、扬雄、刘向、班固、韩愈、柳宗元争驰逐，侵寻乎其相及矣。是时，尹洙与修亦皆以古文倡率学者，然洙材下，人莫之与。至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向慕，为之唯恐不及，一时文字，大变从古。庶几西汉之盛者者，由修发之。

这是历代文论家对欧阳修在散文创作领域贡献所作的经典评价。

自从魏晋南北朝以后，散文创作中形式主义的倾向一直久盛不衰。以六朝小赋为代表的骈文化倾向，成为文人创作的追求和爱好，甚至在公文、制诰中也不例外。作为形式化特征的声律、对仗、用事几乎成为堆砌词藻、卖弄学问的手段。虽然韩愈、李翱等人在唐中叶，曾大声疾呼，主张恢复古文传统，并身体力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始终未成气候。到了宋朝立国，骈文

已成为主宰文坛的潮流，几乎所有的学子士人，都成为骈文的追随者，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体”是这一潮流的典型代表。

然而，“文以载道”毕竟是封建社会对文学艺术的正统要求。如果在太平盛世，尚可以粉饰太平为借口，忽视文章的思想内容的话，那么，到了国势衰退，穷则思变之际，形式主义的华靡文风，往往会成为有志者改革现状的口实。早在欧阳修之前，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痛感于当时文风的浮艳空洞，提出过废止“时文”，复兴“古文”的主张。然而，或因他们的主张过于保守，或因他们个人缺少良好的创作实践，或因客观条件不成熟，他们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反响。

宋仁宗即位后，为了扭转积贫积弱，危机四伏的严峻形势，曾痛下决心，励精图治。改革文风也成为他关注的问题之一。天圣七年、明道二年、庆历四年，他曾三次下诏纠正文弊，指出“文章之宗，必以理实为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也把改革文风作为其重要内容之一，他曾在《奏上时务书》中说：“国之文章，应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欧阳修在回顾其古文运动历程时也曾说过：“天子患时文之弊，下诏书讽勉学者近古，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苏氏文集序》）可见，改变积弊数百年来的形式主义文风，恢复文章“明志”、“载道”的古典传统，已经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要求，并成为统治阶层的意志。这一点是欧阳修古文运动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自韩愈到穆修一大批古文改革先驱者所不具备的重要条件。

欧阳修提倡古文，力倡韩愈的先驱与表率作用，他在《记旧本韩文后》中写道：

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呜呼！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

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

强调韩愈的作用，不仅把宋代的古文运动纳入承前启后的“道统”沿续中，而且为文坛除旧布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榜样。

在推崇和推广韩愈的同时，欧阳修还注意结合现实，对韩文风格中那种“怪怪奇奇”、“只以自嬉”的艰涩怪僻的倾向明确提出矫正，指出：“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要求文章应委婉含蓄，平易自然。并告诫学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这些观点不仅克服了以前复古倾向中矫枉过正的毛病，而且为新文体的实践，提供了易于操作的规范。

除了理论上，欧阳修还身体力行，为古文运动的推广作出极大努力。早在任西京留守推官时，他就与尹洙、梅尧臣、谢绛等人互相砥励，“相与作为古文”，使古文运动成为当时靡艳文坛的一股清新之气。其后，欧阳修又利用身居要职的便利，选拔提携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后进士子。“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宋史·本传》）有意思的是，“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家，除了欧阳修之外，其他五位都是曾受欧指教提携的。可见，欧阳修的奖掖，不仅是知人善仁的明智之举，也为宋代古文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生力军，这是古文运动完成于宋代的又一重要原因。

最后，欧阳修之所以成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当然领袖，成为完成韩愈首发其端的古文复兴事业的功臣，其散文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欧阳修的散文创作，体裁多样，风格鲜明，不仅充分体现了作者平易自然的创作追求，而且表现了他卓越的见识与才能。吴充的《欧阳公行状》中称其“文备众体，变化开合，因物命意，各极其工，其得意处，虽退之未能过”。苏轼则进一步指出：“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此非予言也，天下之公言也。”（《居士集序》）。

欧阳修的政论文，气势酣畅，痛快淋漓，引物连类，逻辑严谨，读之令人神夺魄摇。其代表作是《朋党论》和《与高司谏书》。他的史论文，激情盎然，说理透辟，起承转合，一唱三叹。其《新五代史·伶官传序》被后人誉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韵”。（清沈德潜语）其碑铭祭文，一改前人一味谀颂之习，而是抓住一些带有典型意义的事例，铺陈叙述，娓娓而谈，生动地揭示出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其《黄梦升墓志铭》被清刘海峰誉为“迥宕古逸，当为墓志第一”。至于他备受后人推崇的序跋、景物记，更是风神绰约，摇曳生姿，婉转流畅，平和天然，创造出一种回味无穷的韵味。用苏洵的话说：“纤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舒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嘉祐集·上欧阳内翰书》）他的《六一诗话》，则是有意识地将笔记文学的作法引入文学批评，为传统诗歌批评开创出一种崭新的文体。

文学史家早就指出，宋代文学的两个最鲜明的特征，一是“理趣”，即有较强的理论特色；二是平易，即用语简明，琅琅上口。这两个特色都与欧阳修的倡导有密切的关系。长达一百五十三卷的《欧阳文忠公集》，几乎找不到多少纯粹意义上的景物记文，景物风情在欧阳修笔下不过是抒情说理的媒介。备受后人称道的《醉翁亭记》，不过是通过自然环境和社会风气的描写，委婉地表现了自己以顺处逆的特殊心境。被清人刘大櫆誉为“虚中生情”，“更有情韵意态”的《真州东园记》，在铺叙了种种娱都雅胜之后，曲终奏雅，仍归结为“三君之材贤足以相济，而又协于其职，知所先后，使上下给足，而东南六路之人无辛苦愁怨之声；然后休其馀闲，又与四方之贤士大夫共乐于此”的褒扬激励。甚至连学术性极强的《集古录跋尾》，也常常在考证之余，抒发自己的感慨与联想。欧阳修的这种追求，不仅塑造了他本人

的文章风格，而且影响了整个宋代文学。至于文学语言的平易自然，不仅是欧阳修所极力倡导的、有别于韩愈的宋代古文特色，也是他刻意追求，并最终成为其语言特色的主要境界。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称：“韩柳犹用奇重字，欧苏惟用平常轻虚字。”说明欧文的语言风格在宋代已为世人所公认。

欧阳修的散文对后世影响很大，从同时代的三苏、曾巩、王安石，到明代的宋濂、归有光、茅坤、唐顺之，清代的方苞、姚鼐，都从欧文中汲取过营养。欧阳修无愧为中国散文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欧阳修著述颇丰，宋庆元年间（1190），周必大、孙谦益等人编定的《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共收散文两千多篇，诗词一千馀首，是收录欧阳修作品较全、较早的一个本子。本书选取了欧阳修各体散文六十八篇，大致分为记、序、书、论几类，另从《集古录跋尾》、《六一诗话》、《笔说》、《试笔》、《归田录》中选取了若干段落。由于本书以“小品”冠名，我们在选篇时，有意回避了一些议论色彩较浓的篇什，即使是传世名篇也忍痛割爱，而突出了一些文字轻雅、风格明快的记、序之文。不过，这种选篇方式虽有以偏概全之讥，但也许能使读者从另一个角度窥见欧阳修这一代宗师的精神境界。

本书所用的底本为世界书局1936年刊行的《欧阳修全集》，在选篇、注释过程中，参阅了茅坤的《八大家文钞》、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等书。由于成书仓卒，其中错谬当在难免，敬乞方家指摘赐示。

李世跃

1996年11月30日

目 录

前 言	(1)
伐树记	(1)
养鱼记	(4)
戕竹记	(6)
游大字院记	(10)
真州东园记	(12)
丛翠亭记	(16)
洛阳牡丹记·风俗记	(19)
樊侯庙灾记	(23)
夷陵县至喜堂记	(26)
峡州至喜亭记	(30)
游鲦亭记	(33)
画舫斋记	(35)
醉翁亭记	(39)
菱溪石记	(42)
丰乐亭记	(45)
偃虹堤记	(48)
有美堂记	(52)
浮槎山水记	(56)